



立言金融评论

2024 年第 1 期(总第 43 期)

2024 年 1 月

目 录

会议简报 银行业数字化转型调研行——走进广西“区域性 银行深化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与发展”研讨会成功召开	1
厘清持续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12
金融强国建设需要数字金融支撑	22
以高质量金融人才支撑金融强国建设	28
我国科技金融的发展方向与创新探索	34
关于首都文化金融发展的三个议题	50
永续债拓宽中小银行“补血”渠道	58

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简介

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立言研究院”）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高端金融智库，并自 2020 年初正式开始运营。业务主管单位是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立言研究院旨在充分运用在京智库资源，全面服务于国家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战略目标，着重服务于北京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各项重要任务，致力于为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提供应用性咨询服务。

立言研究院将积极建设首都地区金融智库协调发展平台，有效聚合中央、北京、在京高校及社会金融智库，取长补短、协调配合、形成合力，更好地为北京“四个中心”建设服务，更好地实现各类金融智库与北京发展需求有效对接，努力建设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的一流新型智库。

目前，立言研究院下设研究机构包括：

国际金融与自贸区发展研究所

金融资产管理研究所

地方金融监管与发展研究所

金融科技研究所

文化和旅游金融研究所

产业创新研究所

中国政府债务研究所

金融合规研究中心

政策性金融研究中心

首都金融智库合作基地

地方金融合作与发展组织等

会议简报 | 银行业数字化转型调研行——走进广西“区域性银行深化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与发展”研讨会成功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 2023 年 12 月在广西考察时发表重要讲话。作为 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的首次地方考察，“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广西之行的关键词。通过数字技术推进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深化银行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区域性合作大有可为。

2024 年 1 月 11 日至 12 日，由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与金融科技 50 人论坛主办，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西监管局、广西银行业协会联合主办，广西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广西北部湾银行、腾讯云协办的“银行业数字化转型调研行——走进广西‘区域性银行深化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与发展’研讨会”，在“壮美广西”圆满落地。集两地智慧，助力银行业高质量发展。这是一次金融领域的“双城”双向奔赴的高峰论坛。来自全国的行业知名专家和广西辖区金融监管部门、各银行机构的领导嘉宾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广西银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毛宁主持。

一、开场致辞

会议第一部分，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西监管局二级巡视员、广西银行业协会常务专职副会长滕仲斌作开场致辞。

滕仲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西监管局二级巡视员、广西银行业协会常务专职副会长

滕仲斌在致辞中谈到，2023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将数字金融列为“五篇大文章”之一，凸显了数字金融在高质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助力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性，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已迎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和关键期。结合本次研讨会主题，滕仲斌从三方面谈及对此的思考和认识。

首先，坚持数字驱动，加大探索创新，广西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势头强劲。近年来，广西银行业积极以数字化转型助推行业高质量发展。具体做法包括：一是强化顶层设计；二是优化产品服务；三是深化行业协同。滕仲斌提到，广西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其时已至、其势已成。

其次，顺应时代大势，抢抓发展机遇，持续激发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动能。滕仲斌谈到，各机构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金融与数字技术的有机融合，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一是坚持数字与金融并举。以数字技术赋能银行生产力的提升。二是坚持线上与线下并进。以线上线下协同经营稳妥推进数字化转型。三是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各银行机构应构建与自身业务经营、技术实力相匹配的数字化转型风险管理体系。

最后，搭建行业平台，推动交流协作，凝聚广西银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合力。作为行业自律组织，广西银行业协会将进一步发挥协调服务职能，广泛凝聚行业发展合力。具体措施有三方面：一是完善金融服务平台。推动数字技术在广西银行业金融服务场景的落地实施，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二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金融行业数据治理，引导和鼓励各银行机构积极服务和融入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三是加强行业协同合作。发挥协会各个专委会的协同作用，推进政府、企业、院校与金融机构的协同联动，共创数字化转型新模式，共谋数字金融发展新思路。

二、主旨演讲

会议第二部分，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腾讯云商业银行总经理曹骏作主旨演讲。

杨涛：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杨涛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建设金融强国需要做好“五篇大文章”，并从做好“五篇大文章”的重要性、理解“五篇大文章”的定位与层次、如何做好“五篇大文章”三方面为区域性银行深化数字化转型提供思考与路径。

首先，说明做好“五篇大文章”的重要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金融强国：一是有效缓解我国金融发展“大而不强”的问题；二是服务于“强国战略”的要求。杨涛谈到，能否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直接影响到我国金融体系能否真正“由大到强”。

其次，阐述理解五篇大文章的定位与层次。杨涛指出，需要对“五篇大文章”进行合理定位，从而更好地把握其内在逻辑关系。一则，数字金融是做好“五篇大文章”的主线；二则，科技金融是做好“五篇大文章”的重要“抓手”；三则，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则是做好“五篇大文章”的重要“落脚点”；四则，绿色金融是做好“五篇大文章”的重要补充。基于此，应以数字金融全面改变金融核心竞争力，以科技金融助力提升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以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实现金融价值，以绿色金融保障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最后，指出如何做好“五篇大文章”。综合来看，围绕金融强国的建设目标，做好“五篇大文章”应以数字金融为切入点，尽快推动科技金融、养老金融“增量提质”，促使普惠金融、绿色金融“优化升级”。同时，需要更加理性地认识各类金融活动的风险特征，掌握好创新效率与安全“跷跷板”；优化用以保障创新的基础制度、文化和信用环境，并努力实现政治价值、社会价值和市场可持续价值的有效平衡；基于全球视野综合考虑“五篇大文章”的布局，最终助力提高我国金融业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

曹骏：腾讯云商业银行总经理

曹骏从腾讯云的战略方针、产品矩阵与未来发展展望进行阐述。

首先，指出腾讯云的战略方针。腾讯云定位于“新连接+新基建+新服务”，成为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助手。帮助银行实现连接内部、连接客户、连接生态，提供底层平台等信创基础设施，赋能银行开展开放金融、产业金融、智能金融等业务。

其次，从五个领域说明腾讯云的产品矩阵。第一，TCE 已经成为众多银行业客户的国产基础设施选择，在私有云领域已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国产时代帮助银行客户管理海外服务器。第二，国产应用领域，过去三批国家试点名单客户中有众多机构选择与腾讯云合作，产品注重与中国信息安全评测等国家标准数据接轨，国密达到二级水平。第三，大数据领域，2019 年腾讯云与国有大型银行深度合作，帮助建立 AI 体系，支撑手机银行服务 2.35 亿客户。第四，核心领域，腾讯云与微众银行率先出单元化架构，借助海量服务之道的七大技术手段在微众银行落地。第五，风控领域，腾讯云帮助银行降低风险，国内相关用户数超过 1800 家金融机构，其中，银行机构超过 100 家。

最后，展望腾讯云的未来发展。一方面，努力推动公有云、团体云的建设，参与制定监管标准，帮助区域性银行快速获得资源。另一方面，训练 AI 大模型，结合各种应用场景帮助企业客户解决 AI 生成类、数据分析以及文字识别等问题。作为数字化助手推动未来发展。

三、专题发言

会议第三部分，由行业代表广西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委员、副主任梁定基，广西北部湾银行副行长叶友，柳州银行首席信息官尹冠华，神州信息新动力研究院首席专家薛春雨作专题发言。

梁定基：广西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委员、副主任

梁定基在《广西农信数字化转型实践与思考》的专题发言中，从数字化转型实践探索、数字化金融服务体系构建与应用场景以及未来展望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从四方面谈及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探索。一是以企业级数据治理驱动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小法人大平台的优势，学习借鉴不同类型银行的经验和做法。二是将数字化作为生产要素进行战略投入，率先创建具有科技专业背景的数据管理部门，负责数据治理、数据资产管理和数据统计应用。三是推进企业级全生命周期数据治理，发布“桂数耘”金融数据标准共享平台，将数据变为可阅读、易理解、能共享的数据资产。四是提升信息科技支撑能力，建设面向个性化需求的行社云和共性化的生产云，建成“两地三中心”容灾体系。

其次，赋能场景，构建丰富数字化金融服务体系。从服务传统“三农”领域向赋能农业产业、互联网金融、行业应用等场景演进，推动线上普惠金融遍及千行百业和千家万户。第一，打造涉农生态场景。服务现已遍及 110 个县区市，1.6 万个村，授信金额超过 4300 亿。第二，赋能产业链生态场景。提供产业链金融服务。第三，丰富互联网金融生态场景。现已形成以手机银行为代表的线上金融服务矩阵，服务用户数超过 1300 万户。第四，拓展智能风控场景，开发客户画像功能与客户价值挖掘模型。

最后，展望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未来。梁定基指出，广西农信社将持续夯实基础，释放数据资产价值，深化数据价值高质量运用，构建数字化农村金融体系。用好用足政策红利，做好五篇金融大文章，持续增强金融科技支撑能力，推进重点领域核心业务指标的数据治理工作。为农村普惠金融提供线上农村普惠金融应用，探索数据资源化、

数据资产化、数据资本化，积极研究涉农数据评估目标的可能性，推进银行业长期主义的数字化转型。

叶友：广西北部湾银行副行长

叶友在《北部湾银行数据治理到数据资产的实践与展望》的专题发言中，从数据治理历程与实践经验、数据资产运营管理与赋能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展望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总结性地指出北部湾银行数据治理历程与实践经验。近年来，北部湾银行围绕数据治理，持续建立健全数据系统，2018年开启新一代系统群建设并同步启动数据标准工作，2023年完善数据安全管理机制。叶友从七方面对银行数据治理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一是做好顶层设计，推进数据治理组织建设。二是制定发展策划，强化战略引领。包括数字化转型战略、信息科技战略等。三是标准先行，制定全行统一数据标准规范。四是构建特色落标机制，推动系统数据统一规范。五是健全数据治理制度，保障工作有据可依。六是构建问题整改监督机制，促进数据质量管理升级。七是建立数据治理考核评价机制，以考核促落实。

其次，从五方面说明数据资产运营管理与赋能。一是构建数据中台，推进数据汇聚融合。二是做好数据提炼加工，打造数据服务支撑能力。三是扩充外部数据资源，实现统一外部数据管理。四是理清数据分布，实现数据资产化管理。五是持续强化数据与业务融合的支撑能力，推进数智应用赋能。

最后，谈及北部湾银行的未来发展方向。将建设流程驱动、科技智能、业数技融合、全国领先的数智银行，继续推进数字化转型，以全面推进经营转型、数智营销、数智运营、数智风控与数智管理为总体目标，促进全行数据规模化应用。

尹冠华：柳州银行首席信息官

尹冠华在《柳州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与思考》的专题发言中，详细介绍了柳州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进程，阐述了如何通过全面的战略规划和技术创新，实现了业务模式的根本转变，并指出了在这一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未来的规划。

首先，柳州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计划以其三年期“521”特色战略为核心。该战略聚焦于提升客户服务、产品创新、渠道营销、风险管理和一体化运营。为保证这一战略的有效执行，柳州银行成立了专门的数字化转型领导小组和数据管理部，标志着柳州银行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其次，柳州银行在业务转型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不仅在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领域推出了全线上化的产品，如小摊贷和收银易贷，还在供应链金融和数字函证管理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通过数字化手段强化了零售金融业务，优化了客户体验和服务效率。

接着，柳州银行在数据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通过建立全面的数据治理体系和大数据平台，柳州银行显著提升了数据的集中管理和融合共享能力。在数据质量把控方面，柳州银行推动了数据认

责工作，明确了数据所有者、使用者、数据加工者的职责，为业务决策和客户服务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最后，面对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挑战，柳州银行已经制定了详细的应对策略和未来规划。柳州银行正致力于提高员工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并积极培养引进复合型人才。此外，柳州银行计划加强与同业和科技公司的合作，以更好地应对技术挑战，推动客户服务和产品研发向更高水平发展。

薛春雨：神州信息新动力研究院首席专家

薛春雨在专题发言中，深入探讨了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多个方面，突出了技术的重要性并提供了实际案例和战略指导。

首先，指出银行自身需求的变化、IT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国内政策背景是驱动数字化转型的三大因素。由于集中式的银行系统存在灵活性低和更新周期长的问题，因此需要转向分布式和云原生阶段，这是2005年SOA以来IT行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其次，针对信创背景下国产化服务器稳定性的问题，薛春雨提出通过应用数据分布式来增强系统稳定性。他强调，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第一步是在技术层面进行变革，尤其是将大型系统拆分为分布式系统，包括服务层和数据层面的实施。分布式架构的核心是在物理上进行多重分割，同时在逻辑上保持完整性，适用于微服务和数据层面的拆分，提升银行业务的灵活性和响应速度。

再次，薛春雨介绍了分布式实施的技术实现方式。他提到，在实施分布式系统时，关键在于如何合理地拆分系统以适应不同的业务场

景，同时保持系统的高可用性和稳定性。这一点对于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尤为关键，因为它直接关系到银行业务的连续性和客户服务质量。

从次，薛春雨探讨了中台架构的重要性，并对云服务的不同层次进行了详细解读。他提到，银行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以有效利用不同层次的云服务，如软件即服务（SaaS）、平台即服务（PaaS）和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尤其对中台和 PaaS 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这些服务不仅为银行业务提供了更高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还促进了业务创新和效率提升。

最后，薛春雨强调了云原生技术的两个核心要素：对于运维的便利性提升和产品迭代速度的加快。他指出，云原生技术架构的引入，尤其是在容器化和微服务架构方面的应用，为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同时，对于已有的银行系统，采用云原生技术面临历史遗留问题的挑战，需要策略性地解决与传统系统的兼容性问题。

四、会议总结

在会议总结环节，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信息官高峰首先点评和肯定了嘉宾们的精彩发言。在稍后的《提升数字化能力 加速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讲话中，他围绕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新格局、新趋势、新路径和新动能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总结。

高峰：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信息官

首先，聚焦于数字化转型的新格局，强调需要通过数字金融驱动重构银行业的同时，落实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关政策。高峰谈到，当前正处于银行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多项政策文件的出台强调了银行数

数字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担当；需要通过数字金融重塑银行业的竞争格局；中国特色的监管架构体系有“五大监管”：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银行数字化转型关键需要做好六大核心数字化能力建设：业务战略到差异化执行力、数字化经营与管理能力、数据治理与应用能力、科技支撑与敏捷开发能力、数字化转型风险防范能力、数字金融人才培养与引进。

其次，谈到了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新趋势。在落地“业数技融合”敏态化的同时，注重数字化能力成熟度评价。高峰谈到，可从多视角评估银行数字化转型质效；不同类型银行，数字化转型成熟度不同；结合具体案例说明中小银行“业技数融合”敏态组织架构可加速推动数字化转型。

再次，指出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新路径：数字技术垂直赋能的同时，转型需要大模型加持。高峰谈到，数字化技术可触达不同场景和客群；产业数字金融成为公司金融数字化转型最佳路径；远程银行新平台赋能零售银行数字化转型；AIGC在银行业场景中应用开始有序推进。

最后，阐述了数字化转型新动能。高峰强调了数字技术在现代银行业务转型中的至关重要性，特别指出数字金融人才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核心作用。高峰结合数据治理工程师、金融科技师等的要求，强调了银行业注重对人才数据治理和数字化能力的培养。

厘清持续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其中，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直接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健康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必须紧紧围绕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等三项任务开展工作。”鉴于此，我们需要深入探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重点

从经济视角看，高质量发展强调的是增长的稳定、持续、均衡、公平等；从产业视角看，则包括产业部类完备、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链韧性较强、产业运行效率与效益较好等；从企业视角看，则是企业管理运营水平、核心竞争力、产品价值等表现良好。

对于金融高质量发展而言，应该基于多重视角进行分析。一方面，需剖析金融的内涵。狭义地讲，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金融”一词被定义为：“资本市场的运营，资本资产的供给与定价。”广义地讲，《中国金融百科全书》中“金融”一词被注释为：“货币流

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总称。”其内容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工具以及金融市场等一切与货币信用相关的经济活动。另一方面，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含义，如果从供给侧看，是“产品与服务符合高标准程度”；从需求侧看，则是服务对象的价值获取或主观感受，即带给客户的“获得感”能否持续提升。

由此可见，金融高质量发展可以被分解为若干方面：金融部门自身的改革深化、金融对经济活动的积极作用彰显、金融需求侧的客户满意度提升、基于金融特殊性的管理与政策完善、作为发展“土壤”的生态与基础设施优化等。

二、以服务好实体经济部门为核心要务

金融助力企业部门的健康发展，是保障国民经济高效运行的基础环节，因为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竞争来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能够增强一国综合经济实力。例如，我国目前已经构建了规模大、体系全、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体系，但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包括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协同性与敏捷性等。对此，从供应链金融到产业链金融的创新探索，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金融资源的匹配与风控模式，成为产业链优化的“润滑剂”。再如，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对稳定增长的价值日益突出，甚至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主体，也是强化经济内生动力的主要力量。因此，改善和强化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尤其需要保障对其金融服务的持续、稳定、及时、适度，防止大起大落。

金融必须服务好居民部门的需求，亦即强调金融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一则，伴随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金融需求也变得更多元化，消费、投资理财、创业创新、家庭保障等诸多方面，都需要配以更加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二则，经济增长的成果最终都要落到分配层面，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之下，缓解居民收入、财富、消费等方面的不平衡问题，也离不开金融的作用。对此，金融部门既要减少可能的负面影响，如不完美信贷市场可能使得资源缺乏的居民无法获得改善自身发展的资金，也要主动创新各类个人金融服务模式，真正以客户为中心、促进居民福利提升。

金融部门相对拥有较高门槛与专业性，应该主动帮助客户培育“有效需求”。例如，民营企业的人才储备、管理和经营能力弱，难以主动发掘、培育和提出自身的金融需求，这就需要金融业提供融资之外的“增值服务”。再如，只有帮助居民不断提升金融素养，培育投资者风险识别意识与财富管理能力，才能实现“以人为本”并提供更多平等的金融机会。

三、以提升金融运行绩效为最终目标

提升金融部门自身运行效率，是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银行业保险业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资本市场正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基本形成了完整多样的金融机构体系、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和对外开放新格局。同时，客观来看，我国金融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仍有待提升，还需不断改善行业投入产出效率、改进服务效率与质量、拓展服务能力和

边界等。尤其是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国内外挑战因素众多的背景下，更需要提高运营绩效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强化服务实体经济的基础能力。

体现出金融服务的效益与价值，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应有结果。一方面，金融应该助力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目标。例如，普惠金融在狭义上是指针对特定的群体提供特殊的金融支持，在广义上则指面向所有的金融服务主体，努力弥补原有金融服务的短板。绿色金融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助力，而转型金融则旨在引导高碳行业等“非绿”部门或活动“转绿”或平稳退出。科技金融则是推动科技创新和自立自强，全面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另一方面，金融部门存在价值的最终体现，是促进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社会进步等诸多目标，这也是衡量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硬尺度”。

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的质量和运行绩效，还应该按照国际标准看其是否处于全球“前列”，并且核心竞争力是否逐渐增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 2022》，将“全球金融竞争力”界定为：一个经济体的金融体系相较于其他经济体而言，在全球范围内更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和管理风险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能力。我国该指标在 2022 年居于全球第 8 位，仍然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四、以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究其根本，就是指以改革和优化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供给结构为核心，推动金融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一系列改革举措。首先，从金融机构的角度看，我国银行业机构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但仍然存在发展的“马太效应”和结构性矛盾，如少数银行存在突出的经营风险和困难，中小银行仍需寻找差异化发展道路，政策性银行改革仍在探索之中；证券业和保险业也面临转型和提升的难题，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也需直面更复杂的经济周期、行业周期挑战。由此，整个金融机构体系还需持续优化结构、提升质量，增加金融服务的“有效供给”。

其次，从金融产品的角度看，我国金融业已经形成了极其丰富的产品体系。例如，银行业机构的负债业务、资产业务、中间业务都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综合性、普惠性的特色产品创新逐渐涌现。又如资本市场上的资管产品发展迅速、金融衍生品品种不断增加、匹配长期投资与价值投资的产品数量更多、混合型产品适应了投资者多元化偏好等。当然，与企业 and 居民部门快速演变的需求相比，金融产品供给结构仍需持续优化，尤其是在当前经济不确定性突出的阶段，更需平衡好产品服务效益与安全的“跷跷板”。

最后，金融体系的功能结构配置也需完善。我们知道，一国金融体系的功能包括支付清算、融通资金和股权细化功能，为在时空上实现经济资源转移提供渠道、进行风险管理以及解决激励问题等。综合来看，我国金融业的资金和资源配置类功能发展较快，支付清算和风险管理类职能还需强化，同时其他一些辅助功能还有所不足。如：提

供价格信号，帮助协调不同经济部门的非集中化决策；解决在金融交易双方拥有不对称信息及委托代理行为中的激励问题等。

五、以拥抱新技术和数字化为抓手

伴随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新技术对金融业的冲击愈演愈烈，而金融科技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以银行业为例，据统计，2022年中国银行业机构离柜交易达4506.44亿笔，同比增长103.1%，交易额共计2375.89亿元，行业平均电子渠道分流率为96.99%；2022年，共计有超2600家商业银行网点终止营业，2023年上半年约有1200家。

推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一方面要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从需求侧来看，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实融合等都带来全新的金融需求，这构成了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需要金融产品与服务变得更加智能、便捷、高效、精准。从供给侧来看，金融业本身就是特殊的信息处理行业，当信息技术发生重大演变与迭代时，金融的要素、功能、组织方式、业务类型都必然发生深刻变化。

另一方面，要处理好生存与发展的关系。伴随经济周期、社会结构、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多重挑战，即便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也有众多金融机构“黯然”退出市场。面对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拥抱数字化与新技术显然是一个重要选项，起码可以缓解金融脱媒（金融非中介化）和外部冲击，从而维持金融机构的基本服务功能。在保障生存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发展问题，这需要金融机构全面提升自身综合能力，更需抓住经济增长的“脉络”而拓展业务蓝海。对此，只有充分

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才更有可能找到新增长点与新赛道，不断提升服务效率、降低成本、拓展服务范围和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新技术与数据要素是助力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两大支撑。一方面，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逐渐深入，却也面临技术应用“百花齐放”但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财政部正式发布《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亟待进一步发挥好数据价值，使其实现从数据要素到数据资产的升级，最终“权责匹配”地进入金融创新活动中。

六、以改善稳定性和安全性为生命线

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提升防范风险的能力，是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202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强调“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不同历史阶段的金融风险防范重点也有所差异。2023年，监管部门尤其关注统筹协调金融支持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工作，丰富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工具和手段，强化风险监测、评估和防控机制，推动重点地区风险处置。事实上，金融业需要更好地、更高效地管理风险，而不是消灭风险，因为风险天然就是金融活动最重要的资源之一，这也考验着监管水平和艺术。当前新一轮监管体系改革正在进行中，如何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提升金融业发展的稳健性、在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层面把控好风险，都是保障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努力增强金融体系的“弹性”和“韧性”。所谓具有弹性的金融体系，是指其发挥应有功能、有效防范风险、化解危机及快速修复的

能力。增强金融体系的弹性，既能够适应实体经济部门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需求特点，又能在不利环境下仍然维持基本的资金与资源配置功能，找到稳定的客户来源，并为金融业获得盈利提供保障。增强金融体系韧性，则表明在日益复杂的外部冲击影响下，金融体系依然能够持续运作下去，不会出现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并且在极端风险影响之后仍有足够的恢复能力。应该说，这样才能持续塑造良好的金融“体质”并增强金融系统“免疫力”。

积极促进金融体系提升“开放性”，才能在全球竞争的“大风大浪”中增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底气”。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初步形成涵盖股票、债券、衍生品及外汇市场的多渠道、多层次开放格局。例如，2023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得以完善，内地与香港利率“互换通”上线。再如，金融国际合作向纵深推进，尤其是积极参与设计并签署加入国际清算银行人民币流动性安排，推进落实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本币出资等。可以说，坚持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七、以金融基础设施与生态建设为保障

金融基础设施是承载现代金融体系健康运行的重要基础。从狭义上讲，主要指支付系统、中央证券存管、证券结算系统、中央对手方和交易数据库等支付清算基础设施；从广义上讲，则还包括货币体系、信用体系、技术基础设施、金融标准化等诸多领域。2020年人民银行等六部门发布《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施工作方案》，明确了我国金融

基础设施统筹监管范围包括金融资产登记托管系统、清算结算系统、交易设施、交易报告库、重要支付系统、基础征信系统等六类设施及其运营机构。正如经济发展离不开高铁、机场等基础设施，金融高质量发展也依赖于金融基础设施的支撑。虽然近年来我国以移动支付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令全球瞩目，但与经济发展和国际化的迫切需求相比，仍有许多“短板”和不足。

完善的金融生态是保障金融健康发展的“土壤”。金融生态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金融生态主体，在与外部制度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体系。好的金融生态就是通过合理的激励相容机制安排，促使不同层次的金融参与主体合作共赢、协同创新，实现金融体系的良性成长。健康金融生态一方面包括各类“正式规则”，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这就需要金融法律环境、治理环境的持续完善。另一方面，还有各类“非正式规则”。例如，针对金融活动参与各方在金融交易当中应遵循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我们需要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伦理体系，也需要打造健康向上、共享共赢、风清气正的金融文化氛围。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在 1911 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金融中介提供的储蓄调动、项目评估、风险管理、管理者监督和交易便利化服务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学界围绕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讨中，前者对后者的积极作用逐渐形成共

识。同时，金融与经济之间也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金融结构、功能、治理、稳定性等因素的变化，使得各国金融发展的轨迹产生诸多差异，由此也使金融与经济之间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关系。总之，只要充分依托本土特色并借鉴海外经验，把握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原则、重点与保障，在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国金融业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景可期。

金融强国建设需要数字金融支撑

日前，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把发展数字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之一，为新形势下技术与金融的快速融合提供了顶层设计保障。对于数字金融或金融科技的概念，虽然学界和业界也有一些争议，但其实质内涵基本一致，都是通过数据要素、新技术在金融业的深入应用，全面改变金融的要素、功能、模式、流程、价值等。

一、数字金融变革的实践与理论逻辑

一方面就实践层面看，金融业通过拥抱新技术和加快数字化转型，天然地可借助“数字化力量”来全面优化自身的“体质”，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并对标全球金融发展的前沿水平，不断走向金融强国。另一方面，发展数字金融也有助于其他“四篇大文章”更好地展开，从整体上提高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改善金融部门与国民经济其他几大部门之间的关系，进而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同时，数字金融变革也符合金融发展的内在规律。一方面在实践层面，现代金融业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特殊的信息处理行业，因此，数字化与新技术的变革，必然对金融业态的内容、形式、载体、特点都带来深刻影响。例如，从金融机构看，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22年中国银行业服务报告》显示，银行业机构2022年离柜交易达4506.44亿笔，同比增长103.1%，交易额共计2375.89亿元，行业平均电子渠

道分流率为 96.99%。从产品来看，如在最具创新力的支付结算方面，在生物识别、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风控、3D 摄像头等先进技术发展引领下，新兴支付方式不断涌现，从银行卡支付、扫码支付拓展到刷脸支付、刷掌支付，满足了用户多样化、个性化的支付需求。总的来看，这些变革已经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关键要引导好技术与金融融合的方向与重点，把握好新型风险的识别与金融体系安全底线。

另一方面在金融理论层面，也受到数字化与新技术的影响，在研究假设、研究方法、理论逻辑方面都产生了诸多变革，将来自然可能对金融实践带来深远影响。

例如，在宏观金融领域，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应用，有助于更好地进行金融统计分析，各国央行近年来都努力运用新技术，服务于经济金融运行、货币政策操作、金融风险识别等工作。再如，从电子货币到数字货币，也对于现代货币的内涵、微观基础和影响机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微观层面看，行为金融学是金融学、心理学、社会行为学的交叉性学科，力图解释金融市场上出现的各种异象，发掘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和决策背后的一般规律。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往往是从金融异象入手，探寻形成金融异象背后的规律。在大数据和前沿技术的支撑下，行为金融学的研究也获得更广泛的实验基础保障。现有的量化投资模型很多就是基于行为金融学的思路与范式支撑。

二、把握数字金融的核心要素与发展重点

首先，要更好地理解数字金融，离不开几方面重点要素的剖析。一是可应用于金融领域的新技术。对此尤其要避免“短期内高估、长

期内低估”某项创新技术的金融应用，充分把握好“技术成熟度”与“应用广泛度”，并且从现代金融活动的需求痛点出发，围绕成本收益考量，不应“为技术而技术”。同时，要努力缓解我国数字金融与金融科技领域“技术应用百花齐放”、但“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仍待进一步突破”的问题。

二是数据要素。与新技术作为数字金融“新生产方式”对应，数据则是数字金融创新的“生产资料”，二者共同形成了金融创新的“新质生产力”。当前金融业需积极应对“数据—数据要素—数据资产”的迭代升级，真正促使数据资产能够给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带来助力。

三是场景落地。借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金融科技的分类，数字金融理应也涵盖支付结算、存贷款与资本筹集、投资管理、市场设施四类，其中更多的场景创新体现为对原有模式的边际改良，短期内还难以带来颠覆式重构。

四是风险与合规。数字金融发展需关注几方面风险，包括模型算法风险（对模型数据的准确性和充足性进行交叉验证和定期评估，要求建立对模型和算法风险的全面管理框架）、创新业务合规性（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数据安全、合规销售、产品及服务定价、声誉风险、反洗钱及反恐怖融资等方面的合规）、自主创新与自主可控（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技术的全面性和复杂性需要越来越多的开放与合作，金融机构实现完全自主创新的难度较大，且成本较高）、数据治理风险（金融业是数据密集型产业，积累了大量的跨周期数据，且以个人数据为主，潜在风险影响较大）。

五是基础设施与生态。狭义的金融基础设施主要指支付清算体系，包括支付系统、中央证券存管、证券结算系统、中央对手、交易数据库等。广义的金融基础设施则包括更多金融生态要素，如征信体系、技术基础与设施、财务与会计、金融人才与金融文化等。只有不断完善数字化时代的新型金融基础设施，才能促使数字金融活动更加高效、合理运行。

其次，在上述重点环节中，应该把数据治理作为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因为对于经济与金融范式的转变来说，数据是最重要的新型生产要素。从政策层面看，“数据二十条”已提出我国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四梁八柱”，《“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强调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核心引擎。而对于金融业的数据治理，相关部门也出台了众多引导和规范的政策。

在实践中，一方面从行业层面看，数据要素提供了最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之一，为行业互联互通和效率提升建立了新保障。人民银行印发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中，也明确提出“激活金融数据要素潜能”“加强数据能力建设”“夯实金融创新发展数字底座”。另一方面，从机构层面看，数据治理成为金融机构管理创新、业务创新的重要切入点。如何充分发挥海量数据规模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激活数据要素在金融机构“生产函数”中价值，也成为金融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

此外，数据治理也是打通金融服务实体“堵点”的重要环节。例如，当前各方热议的产业数字金融，就是充分利用数据的价值来改变

金融服务中的信息不对称、信用保障不足等矛盾，使得产业链、数据链、资金链等更有效地融合，最终能够有效提升金融资源匹配效率。

三、数字金融助力完成其他四篇“大文章”

对于“五篇大文章”来讲，笔者认为，数字金融能直接影响金融核心竞争力与服务实体的能力；科技金融，是为了提升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增强长期经济内生动力；普惠金融与养老金融，体现出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绿色金融，既是新形势下的国家战略重点，也是能够形成国际共识的主要切入点。

首先，就发展科技金融来看，一方面需要深入探讨需求侧的金融支持对象，兼顾科技企业与科技创新活动、平衡好支持基础性重大科技创新与应用性科技创新、增强科技企业的韧性与金融需求能力，要做到这些，可能需要依托数字化手段、协助科技主体改善金融“有效需求”。另一方面，从科技金融供给侧看，相关痛点包括：更好地匹配科技企业估值特征，同时围绕科技企业需求“痛点”，做透做深科创金融服务，实现“授信+非授信、金融+非金融、融资+融智”的多种组合；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抓住重点科技领域建立专营团队、提升专业能力，并且探索与各类机构和组织的合作，持续建设科技金融服务生态；做好外部合作生态与风险分担机制等。依托于数字化与新技术，这些工作都能够“提质增效”，使得数字金融创新反过来有助于服务科技创新。

其次，对于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来说，数字金融的价值应用都有两个层面。一方面，是通过加快数字化转型来提升金融效率，优化金

融功能,保障金融安全,使不同类型金融服务的质量获得“水涨船高”的结果,由此各类群体都能从这一变革中受益。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发挥数字金融的资源匹配功能,把合适的金融产品提供给合适的客户,从而产生“精准治疗”的作用。如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探索,集中部分金融资源,通过精准触达、高效组织、大数据征信保障、智能风控等,以低成本、高效率的原则提供给特定个人和企业,使其获得应有、合理、适度的金融支持。在养老金融探索中,以数字化助力客户全生命周期的养老金融资源优化与资金管理,提供适应性的数字金融产品以改善服务效果,更加精准地进行客户画像与服务配置等。

最后,就发展绿色金融而言,也面临几方面痛点。例如:难以有效监测、计量、验证绿色金融产品的环境效益或 ESG 价值;环境信息缺失引致的信息不对称,增大了“洗绿”“漂绿”风险;过度强调“绿色性”可能带来金融机构成本上升、风险性与脆弱性增加,影响经营可持续性等。对此,数字金融与金融科技手段显然能够缓解这些矛盾,也有助于推动实现绿色金融服务的标准化、透明化,进一步改善绿色融资、投资、资产管理、碳核算等活动。

以高质量金融人才支撑金融强国建设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各行业、各领域的兴旺发达归根到底也都要靠人才。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这一重大战略的出台充分表明，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人才队伍建设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不容低估的重要地位。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金融人才也是我国人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我国金融系统积极创新人才发展体制机制，不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初步形成了一支规模较大、门类较全的金融人才队伍，有力推动了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为我国金融人才队伍建设指明方向

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这是做好我国金融人才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金融工作必须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金融队伍的纯洁性、专业性、战斗力为重要支撑，以全面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为重点。会议还提出，要坚持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标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金融干部队伍。这些表述说明，在朝着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的前景过程中，无论是金融发展质量的提高、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还是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都需要一支高质量的金融人才队伍去实施、去推进。只有把金融人才队伍这个重要支撑力量真正夯实了，我们的金融强国建设才能扎实有效、一步一个脚印地朝前推进。

深刻领会金融队伍的纯洁性、专业性、战斗力的丰富内涵，是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国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以高质量金融人才队伍有力支撑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前提。

纯洁性是政治要求，即新时代的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必须深化金融从业者对金融工作政治性和人民性的认识，拥护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深刻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本质。同时，要通过惩治金融领域腐败和处置金融风险同步推进、严肃追责和追赃挽损同步推进、建立制度和强化制度执行

同步推进，来筑牢防火墙，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强化全面从严治党的氛围。

专业性是业务能力要求，即新时代的金融人才必须能够准确把握金融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掌握金融业及其相关领域（如经济、法律、会计、科技、社会等）的基础知识、基本业务流程、核心能力，了解国内外金融实践的新变化新趋势新动向，有过硬的专业能力。

战斗力是作风要求，即新时代的金融人才必须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直面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的考验，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在矛盾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同时把握好斗争策略，破解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各类难题，同时办好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两件大事。

二、加强金融人才队伍建设的战略目标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我国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标准，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扎实有效的工作举措，全面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不断提高金融人才工作质量，确保我国金融队伍的纯洁性、专业性、战斗力。

从建设目标上看，可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分别加以刻画：

——党对金融人才工作的领导持续加强。党对金融人才工作的领导体制趋于成熟和定型，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和地方党委金融工作委

员会在金融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金融业务工作与金融人才工作的协调协同机制不断完善。

——金融人才队伍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金融人才队伍规模稳步扩大；金融人才专业分布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更加契合；新型金融人才队伍适应新型金融业态的发展；紧缺急需金融人才数量显著增加；金融人才队伍梯次结构更加合理；金融人才的全球视野和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

——金融人才体制机制更加高效。市场在金融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人才供求、价格和竞争机制进一步完善，金融人才评价、流动、激励约束机制更加健全，政府的金融人才宏观管理、政策法规制定、公共服务等功能得到有力加强，金融人才的培育和使用机制更加完善。

——金融人才发展环境继续改善。金融人才的干事创业空间不断拓展，工作和生活环境持续优化；金融人才服务的专业化、社会化水平持续提高，医疗服务、子女教育、公共交通、文化休闲设施等条件更加完善。

归结起来，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我国金融人才工作要不断提高质量，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金融人才队伍，以高水平的人才队伍有力支撑金融强国建设。

三、加强金融人才队伍建设的战略路径

第一，聚焦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研究未来我国金融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演变趋势。特别是要围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部

署（例如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等等），梳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人才需求的总体规模、基本结构和重点领域，为金融人才队伍建设明确战略愿景。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搞清楚未来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知识结构。例如，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除了掌握基本的金融知识之外，还必须熟悉国内外科技创新的演进规律，绿色发展的总体格局，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达峰带来的金融服务需求变化，以及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对金融业发展的冲击效应等专门化知识。

第二，加快培育和开发紧缺人才，完善金融人才评价体制。要完善紧缺金融人才培养和使用政策，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重点领域采取有效措施鼓励金融机构与高校、科研院所加强合作，建立校企联动的紧缺急需金融人才培养模式。同时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开展紧缺急需和重点专业领域人才专项培训工作。同时，要加快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人才评价标准体系，建立由党政机关、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行业组织、专家学者、优秀人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方面代表组成的专业化金融人才评价专家库，探索建立金融人才分类分层分级评价体系。

第三，在金融人才建设领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金融人才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关键是使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协同发力，共同破

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金融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一要强化党和政府在金融人才总体规划、宏观管理、法治建设和公共服务方面的重要作用。二要充分调动用人单位主体在金融人才培养、吸引和使用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要逐步打破户籍、地域、身份、学历、人事关系等制约，促进人才资源合理流动、有效配置，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金融人才市场体系。

第四，加大金融人才服务体系建设力度，为金融人才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环境。要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各方面的积极作用，着力建设功能完备、高效便捷的金融人才服务体系。一要健全包括组织任命、公开遴选、校园招聘、海外招聘、网络招聘等在内的金融人才资源配置体系。二要搭建并完善金融人才服务平台，为金融人才引进、政策咨询、培训交流提供专业化、公益性服务。三要组织引导高端智库、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展有关金融人才的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为我国金融人才政策提供咨询建议。

我国科技金融的发展方向与创新探索

当前我国科技金融发展成效显著，具体表现在银行业金融机构成为科技金融的“主力军”、资本市场成为科技金融的“生力军”、科技保险助力科技企业风险管理、科技金融政策探索与改革试点不断深入等方面，同时，我国科技金融发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新形势下制定科技金融发展战略，需要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助力强国战略实施；服务于构建可持续的市场化创新体系；从重规模转向重质量，着力打造科技金融强国；高度重视数字化背景下对新型科技金融的创新探索；努力优化科技金融生态，夯实科技金融创新基础。另外，抓住推动科技金融创新的重点环节，夯实科技金融健康发展的基础要素。

一、科技金融的内涵与特点

20 世纪初以来，伴随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进步、资本集聚，科技与金融的融合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回顾历史，科技与金融的关系始终呈现相辅相成的特点。一是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自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众多理论与实证分析都表明，技术进步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而与之相对应，金融和资本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及影响力也十分显著。二是科技对金融创新的促进。金融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特殊的信息处理行业，提供信息服务也是重要的金融业务之一，因此，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对金融创新至关重

要。如早在 19 世纪，银行就是新技术应用的重要客户，电报技术令证券交易所的运作发生了质的改变。电报发明于 1844 年，当时纽约证券交易所立即使用该技术与距离遥远的券商和投资者进行通信，全面扩大了市场参与者范围。三是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快速迭代，进而使得金融业创造出新的业务模式、应用、流程和产品，从而对金融要素和金融功能带来深远影响，反过来金融业对科技创新也进行全面布局或支持，二者的关系跨越了早期的单向支持阶段，呈现出融合共生的特点。

迄今为止，政策层、学界、业界所讨论的科技金融，更多还是指金融如何支持科技企业与科技创新的问题。具体而言，对于科技金融，需要从科技金融需求侧的狭义视角和广义视角以及科技金融供给侧三个方面进行解读。科技金融需求侧是指基于科技金融产品或服务的支持对象，科技金融需求侧的狭义视角通常限于特定类型的科技创新企业及其创新活动，科技金融需求侧的广义视角可以涵盖所有科技创新主体或全部创新活动。科技金融供给侧指提供科技金融服务的主体和形式。

其一，从科技金融需求侧的狭义视角看，科技金融是指致力于支持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的金融产品与服务。一方面，科技创新企业通常是指技术应用程度较高、产品创新与持续发展能力突出的企业。根据我国政府的相关政策，科技创新企业通常可分为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另一方面，面对不同类型科技企

业的金融需求特征，金融机构可以提供一般性的产品与服务，也可以定制出更多特色化的专项科技金融产品。

其二，从科技金融需求侧的广义视角看，科技金融是指支持各类科技创新活动的金融产品与服务。科技创新是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总称，指创造和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以及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提供新服务的过程。科技创新通常可分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等。与之相对应，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具有更加广泛的内涵，如既包括典型的“硬”技术创新，也包括“软”技术和模式创新；既包括基础性重大科技突破，也涵盖走向市场化的应用性技术创新；既包括支持纳入各类产业政策支持目录的科技企业，也关注传统企业的科技创新与技术升级活动等。

其三，从科技金融供给侧视角看，科技金融可以包括面向科技企业、科技创新的投融资、支付结算、风险管理、信息管理等核心金融功能，也包括支持科技企业、科技创新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等核心金融要素，还可涵盖用于保障和服务科技创新的金融政策、金融制度、金融生态、金融基础设施等因素。尤其从融资视角看，科技金融远不止各方最关注的科技信贷，还包括其他众多直接融资、结构性融资产品。同时需要关注的是，随着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发展的持续深入，科技金融供给侧主体不仅限于持牌金融机构，还纳入了大量新兴科技企业、数据企业、平台企业和中介服务组织。

二、我国科技金融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在实践中，我国科技金融政策支持和科技金融统计的范畴，通常是基于科技金融需求侧的狭义视角，即限于特定类型的科技创新企业及其创新活动，其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银行业金融机构成为科技金融的“主力军”。近年来，诸多商业银行努力开发专属科技信贷产品，创新专营信贷体系，设立专营机构和服务团队，实现差异性、定制化产品支持与服务。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计，截至2023年7月28日，我国已设立科技特色支行、科技金融专营机构超1000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6月末，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2.5万亿元，同比增长41.5%，连续3年保持30%以上的较高增速；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2.36万亿元，同比增长25.1%，连续3年保持25%以上的较高增速；全国“专精特新”企业贷款余额为2.72万亿元，同比增长20.4%，连续3年保持20%以上的增速。此外，2023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3年三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2023年三季度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21.28万家，获贷率（即获贷企业户数与名录内企业总户数之比）为47%，比上年末高2.7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本外币贷款余额2.42万亿元，同比增长22.6%，比同期各项贷款增速高12.4个百分点。

第二，资本市场成为科技金融的“生力军”。近年来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不断深化，依托科创板、创业板、北京证券交易所等在内的多层次服务体系，持续加大对科技企业与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根据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截至 2023 年 7 月 27 日，累计已有 1600 多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 A 股上市，占 A 股全部上市企业数量的 30%以上；2023 年新上市企业中，60%都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另外，相关金融管理部门还推出科创票据、科创公司债等债券产品，拓宽科技型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引导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至 2023 年 6 月末，科创票据、科创公司债余额约 4500 亿元，其中，科技型企业发行科创票据的余额达到了 2264 亿元，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的余额达到了 2258 亿元；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规模近 14 万亿元。有力支持了科技企业的多元化风险融资需求。

第三，科技保险助力科技企业风险管理。2021 年 11 月，原中国银保监会印发的《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指导意见》，要求保险机构强化科技保险保障作用及强化科技保险服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已有数十个科技保险险种，覆盖科技企业产品研发、知识产权保护、贷款保证、关键研发人员健康和意外风险保障等多个方面。同时，鼓励保险资金对接科技企业融资，也是实现保险与科技共赢的重要环节。如根据 2023 年 9 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优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标准的通知》可知，对于保险公司投资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未上市公司股权，风险因子（即保险公司投资和经营业务的资本占用，下调风险因子，意味着保险公司可以进行更多投资）应为 0.4；科技保险适用财产险风险因子计量最低资本，按照 90%计算偿付能力充足率。

第四，科技金融政策探索与改革试点不断深入。近年来政府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不断完善科技金融相关政策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全方位的政策支持机制。各地方政府也在总结前期做法的基础上，探索出台更具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如2023年10月，深圳市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实施意见》。另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信息，截至2023年7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多部门在北京、上海、济南等7地设立了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已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我国科技型企业跨境融资便利进一步深化：稳步推广跨境融资便利化试点政策，允许中小微高新技术企业在一定额度内自主借用外债，推进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外汇管理试点，鼓励和引导外资通过私募股权基金参与投资境内科技型企业。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科技金融发展虽然成效显著，但也面临一些挑战。一是重点领域的科技金融服务深度尚显不足，尤其是针对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领域、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金融支持等；另外，对广义视角下的科技创新活动支持也不足。二是单一、局部的科技金融创新产品越来越多，但尚缺乏能有效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三是直接融资支持科技企业与科技创新的空间还未充分打开，尤其是与科技创新特点相匹配的风险投资，因各种因素制约还未发挥出应有作用。四是提供科技金融服务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缺乏高效匹配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时对科技创新的理解和评估能力不足，有竞争力的复合型专业人才配置较为有限，对科技活动的风险理解和管控水平有待提升。五是政策性金融

支持力度和政策性工具丰富度仍然不够，尤其是针对难以仅依靠市场力量的底层、重大、前沿技术创新领域，还需不断探索政策性金融支持路径和模式。六是缺乏系统性、可信度高的科技企业信用评估模式和评级标准，使得“高人力成本、高研发投入、轻资产”的科技企业难以符合金融服务准入标准，相应的增信手段不足，尚需努力破解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评估难”问题。七是针对科技企业、科技创新需求的综合性风险管理、分散机制仍有待完善，现有的科技保险、担保等产品发展整体滞后，新型的全产业链风险管理工具创新明显不足。八是科技企业尤其是中小科技企业的业务不确定性较强，信息标准化、透明度和披露程度都有待提高，自身也缺乏充分的金融“有效需求”能力。九是外资支持科技企业遇到新挑战，伴随科技创新的国际化趋势，对科技领域投资具有较高意愿的外资理应成为当前支持科技金融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由于国内外复杂因素的影响，近两年遭遇了一些问题。十是运用金融科技成果反过来支持科技创新的探索不足，没有充分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动金融资源链、技术创新链、信息链、产业链的高效融合。

三、新形势下科技金融的发展方向与策略

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助力强国战略实施。现代金融的核心价值是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因此，科技金融发展战略设计不能局限于机构与产品层面，而是需要以科技金融活动的最终效益与效果来衡量。一是通过科技金融促进科技创新，进而真正落实到产业层面，实现科技、产业、金融三者的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效率提升，最终提

高全要素生产率（通常被视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二是通过科技金融的“撬动”作用，最终既增强基础科研能力，使国家综合竞争能力与结构性比较优势更加突出，又能够支持应用性技术创新，进而助力产业升级、提升经济活跃度以应对就业等方面的挑战。

服务于构建可持续的市场化创新体系。科技金融发展不仅要遵循金融发展规律，更要尊重科技创新的内在规律。一方面，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真正建立由产业和企业主导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避免过度干预和低效干预，也不能简单地把各类创新主体、创新模式、创新要素任意叠加，而是要依托现代科技创新的前沿特点和前瞻路径，依靠金融的力量打造新型创新联合体模式，激发“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科技金融的支持对象需要从狭义到广义逐渐扩展，既要有关键核心技术、“硬”技术创新为主线，也要支持各类业务创新、模式创新、生态创新等。值得关注的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实融合已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无论是数字产业化的高精尖部分，还是产业数字化的充沛蓝海，都是科技金融助力创新的重要抓手。

从重规模转向重质量，着力打造科技金融强国。从整体上看，当前我国金融体系经历了多年快速发展，包括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在内的诸多指标已经居于全球前列，但整体上仍然呈现“大而不强”的局面。有鉴于此，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金融工作要“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自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可以向银行申请技术开发贷款以

来，我国科技金融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就，诸多金融机构都把科技金融作为重要的业务发展方向。然而，虽然科技金融产品的规模仍有增长空间，但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运动式、低效的现象，这就需要更加重视科技金融的创新质量、结构、效率等，尽可能解决现有科技金融服务布局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高度重视数字化背景下对新型科技金融的创新探索。一方面，当前金融科技与数字金融的创新重点正在从居民端向企业端转移，这对于缓解特定行业面临的传统金融服务成本高、效率低难题起到重要作用，其中对科技领域的金融支持也同样实现效率提升。例如，近两年国务院和各部门针对供应链金融制定了多项政策，为促进和规范供应链金融行业发展形成了制度框架；同时新技术的深入应用，也加快推动了供应链金融行业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涌现出层出不穷的商业模式，其中各产业链上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都是数字化供应链金融发展的受益者。另一方面，不同金融机构越来越重视金融科技投入，如根据各商业银行公布的年报数据来看，2022年，国有六大行投入规模最大，其中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科技投入金额居于首位，高达262.24亿元，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以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金融科技投入分别达到232.11亿元、215.41亿元、232.90亿元、116.31亿元及106.52亿元。此外，为了保证金融科技战略的推进和落地，各银行在科技人才投入上也不断加码。由此看来，金融业机构自身完全可以成为提出科技需求、拉动新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

努力优化科技金融生态，夯实科技金融创新基础。金融生态通常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主体，在与外部制度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体系。科技金融生态建设的重心就是通过合理的激励相容机制安排，促使不同层次的参与者合作共赢、协同创新，通过科技与金融的全面融合，努力实现多层次的科技金融发展目标。其中，既包括与科技、金融相关的诸多“硬生态要素”，如新型的数据要素设施保障，也包含如信用、标准、人才、政策等在内的“软生态要素”。对此，政府与监管部门要从优化科技金融生态入手，促进科技金融发展“土壤”的改良。

四、抓住推动科技金融创新的重点环节

（一）基于科技金融需求侧的探讨

兼顾科技企业与科技创新活动。一方面，各类科技企业是科技创新的核心力量，只有满足好科技企业的各种金融需求，才能在企业微观层面上保障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顺利推进；另一方面，传统产业与企业的创新活动受到更多制约，也通常缺乏科技创新能力，同时获得科技金融支持的可能性更低，如果能通过加强金融服务激发其活力，就可能使科技强国建设获得更广泛的基础。例如对于数字经济来说，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更加迫切，需要深入探索金融工具、金融模式的创新，引导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使传统产业实现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

平衡好对基础性重大科技创新与应用性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和节奏。一方面，我国的基础性科技研究与创新能力仍显不足，如果仅靠政府财政资源支持，可能会陷入“撒胡椒面式”（即资源使用的平均主义，平均分摊，所谓“阳光普照式”的分配方式）的困境，如果依靠金融资源支持，则需要有与长期风险相匹配的模式创新。另一方面，应用性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模式虽然更加成熟一些，但仍存在成果转化不顺畅、长期资本配置不足等问题，还需不断探索符合国际惯例与国情的模式。金融对二者的支持力度和节奏能否平衡好，影响到科技创新的短期与长期目标是否能协同好。

增强科技企业的发展韧性与金融需求能力。一方面，科技创新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较为突出，科技企业虽然在人才、技术、专业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并不意味着其管理水平、市场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优于非科技类企业，只有对标海外一流同类企业，努力提升科技企业的价值与生命力，才能更顺利地获得金融资源支持。另一方面，科技企业特别是中小科技企业，在了解国家金融政策、理解金融体系的标准与要求、运用合适的金融工具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短板，使其难以主动与金融资源对接或提出适合自身特点的金融需求。

（二）基于科技金融供给侧的探讨

持续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一是从监管角度给予银行科技金融创新更高的风险容忍度，以及制定更切实可行的考评机制。二是致力于发展科技金融的银行需要重视系统规划适应科技金融发展的组织架构、网点布局、人才队伍、产品服务、授信审查评

价、风险管控、考核评价、问责免责等机制。三是努力优化授信模式并更好地匹配科技企业估值特征，同时围绕科技企业需求“痛点”，做透做深科技金融服务，实现“授信+非授信”“金融+非金融”“融资+融智”等多种组合。四是抓住重点科技领域建立专营团队、提升专业能力，并且探索与各类机构和组织的合作，持续建设科技金融共赢机制。五是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的资金与运营优势，加大中长期资金支持力度，助力科技企业解决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同时运用科技创新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实现政策性金融服务与商业性金融服务的有效配合。

不断提高资本市场服务科技企业的能级。一是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不能操之过急，需要为科技创新构建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二是落实 2023 年 6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行动方案》，持续完善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债券发行、并购重组“绿色通道”；优化科技型企业股权激励制度机制；改善科技型上市公司融资环境；适当提高对轻资产科技型企业重组估值的包容性，支持科技型企业综合运用各类支付工具实施重组等。三是从充分发挥创投基金的作用入手，努力完善科创投资产业链，探索优化税收等相关政策，从而在科创领域形成更充足的长期资本。重点是畅通创投机构的“募投管退”全链条，拓展创投基金的中长期资金来源，完善 IPO（首次公开发行）、并购交易、协议转让、回购、清算等多元化退出方式。

积极发挥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作用。非银行金融机构助力科技金融的潜在市场较大。例如，信托公司可结合科技企业的个性化需求，依托大数据和新技术，探索押品差异化管理、线上化管理和动态化管理新模式，提供动产和权利融资及相关信托金融和法律服务，探索开展知识产权信托、数据信托、数字供应链信托等新型权益管理与服务。再如，融资租赁在支持科技创新中将大有可为，可以科技企业的专利等知识产权作为租赁物，探索为技术密集型企业提供租赁服务；进一步创新“租投联动”模式，努力为科技企业提供兼具定制化和标准化的特色产品，在协助科技企业融资的同时，与企业共担风险和共享收益。

全面优化科技金融的风险管理机制。一是直面科技企业高成长性、高风险的特点，促使科技金融服务机构打造高度专业化的团队，不断提升面对特殊金融风险的把控能力。二是进一步创新支持科技企业发展保险产品与模式，为各类科技创新与应用场景提供多元化的风险分担机制，帮助科技企业管理好研发、生产、销售、售后以及其他经营活动的全流程风险。三是推动服务科技企业的融资担保业务模式创新，发挥与科技保险的互补作用，共同完善科技金融风险补偿机制。

（三）基于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探讨

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这意味着科技金融不仅是单方面的金融支持科技，而是应与产业一起，实现彼此更加深层的、内生的互动融合。

积极围绕创新企业集群、创新产业链来探索金融支持模式。创新企业集群实现了科技资源的规模经济效应，创新产业链则体现各类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定位互补关系，其相应的共性金融需求非常突出。探索完善符合二者需求特点的、标准化与个性化相结合的科技金融产品与服务，推动多方合作的产业链金融创新，在促进科技创新研发链、产业链、市场链“三链协同”的基础上，着力实现科技创新链、成果转化链、金融资本链的协同。

大力发展数字科技金融，实现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一方面，加快推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使得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积极应用新技术全面改进业务模式，支持科技型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在合规基础上的全面合作，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多的应用场景和需求动力。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数据要素和新技术改进各类金融服务与产品，既从一般意义上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协调发展，又从特殊意义上针对科技金融产品进行技术赋能，缓解成本、信息、效率等方面的固有难题。

五、夯实科技金融健康发展的基础要素

创新与巩固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积极推动数据要素在科技金融活动中的作用，加强对科技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的数据治理，提升数据信息的透明度、标准化程度，缓解科技金融服务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另一方面，密切围绕财政部印发的《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推动科技产业链数据的可计量、可估值和进入财

务报表，构建科技金融数据资产支撑体系，为科技融资提供更多创新制度保障。

探索完善面向科技企业的信用评估机制。一是推动科研诚信体系建设，促使科技创新活动的参与主体能够坚持诚信原则，从而更好地符合金融支持条件。二是鼓励征信机构完善科技企业信用评级技术、评级机制，综合运用金融数据和替代数据，构建科技企业评价模型，增加科创类评价指标。三是研究和发掘适合科技企业特点的增信手段和模式，努力畅通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间的“信用信息渠道”。

梳理政府支持政策并提升政策执行效率和稳定性。一是当前的科技金融政策体系虽然内容众多，但不同政策的协调性仍然不足，部分政策的可操作性也存在问题，需要进行优化调整、增强政策合力。二是地方的改革创新试点，既要通过不断深化而助力区域科技金融健康发展，也可对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三是随着科技活动的日新月异，科技金融政策既需要保持一定的长期持续性，也要与时俱进、动态优化。四是坚持推动科技金融的制度型开放，更好地“引进来”和“走出去”对接科技与金融资源。

健全中介服务体系和专业人才服务保障体系。科技与金融的高效融合，离不开中介服务机构的支撑。对此，一是可鼓励打造各类科技金融服务平台，致力于促进实现科技金融服务的系统化、规范化、便捷化。二是全面提升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服务科技金融的能力，这类机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信用评估机构、科技咨询机构、技术转移和转化服务机构等。三是大力培育专业人才

队伍，加强科技与金融复合型人才培养，探索建立科技金融经纪人等制度。

强化科技金融伦理与文化建设。一方面，新兴科技跨越式发展带来了更多伦理问题，而现代金融业也受到更多的伦理约束，由此衍生出金融科技伦理问题。对科技金融来说，需要高度重视伦理建设，不断探索金融支持科技发展的“软法”约束与合理行为逻辑。另一方面，健康的金融文化有助于推动金融业安全、健康、稳定发展，科技金融更需要加强文化建设，从而助力平衡好效率与风险的“跷跷板”。

关于首都文化金融发展的三个议题

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按GDP占比，仅次于金融业。多年来，北京积极推动文化金融发展，助力文化产业繁荣，成为了全国文化金融发展的典范。

在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北京文化金融迎来新的发展周期。北京文化金融是“首都文化金融”，这个概念有特定的指向性，要基于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要有首都特色，引领全国文化金融发展。就首都文化金融发展而言，笔者认为有三个议题十分值得讨论：

一、文化金融在首都金融业中是何种地位？

北京市不断优化文化金融政策体系和结构，完善文化金融服务手段，推动文化金融服务和工具创新，为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2003年我国启动文化金融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进入新时期。北京以“文化创意产业”为发展重点，推出了一系列产业促进政策，其中对金融支持与服务也有政策上的设计。200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银监局联合出台了《关于金融支持首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最早出台的文化金融专门政策之一，体现了全国领先性。此后北京连续出台文化金融专门政策，主要包括2012年的《关于金融促进首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意见》，2018

年的《关于促进首都文化金融发展的意见》等。2020年2月，北京市文化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北京市关于加强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将北京文化金融发展推向新阶段。

如今回头看早期北京市文化金融政策内容，我们依旧可以感受到当年相关部门在政策设计上是用心的，不仅框架和逻辑非常严谨，而且很多设计很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北京市推出“投贷奖”等政策措施，持续为文化产业“输血”、助力企业“造血”，是全国文化金融政策的典范。北京市构建了以“文创板”等为主要平台的文化金融公共服务管理体系，积累了大量经验。

经过多年发展，北京已经成为全国文化金融发展的标杆城市。文化金融在北京首都金融发展布局中居于重要地位，这个定位基于这样几个原因：一是文化在北京的重要性，决定了文化金融的重要性；二是北京文化金融发展迅速，市场规模大，体系完整；三是北京市早已将文化金融纳入到了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总体战略当中。

近年来，北京市召开的两次金融工作会议都将文化金融作为发展首都金融业的重要板块。2017年12月14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金融工作会议，研究部署首都金融工作，强调努力做强做优首都金融业，重点对发展科技金融、文化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做了要求，其中要求文化金融要在文化、版权、旅游、体育等领域打造一批文化金融品牌。2021年12月24日，北京市召开金融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要推动首都金融业提质增效，培育新增长极。文化金融被列为首都五大金融业之一，五大金融业包括科创金融、绿色金融、文化

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会议指出，文化金融与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息息相关，要鼓励金融机构围绕文化创意、知识产权和版权等领域创新金融产品，把文化软实力蕴含的能量充分释放出来。

北京市很早就将文化金融作为金融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2011年发布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金融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健全文化金融服务体系”；2016年发布的《北京市“十三五”时期金融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开展文化金融创新”，与民生金融、数字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等并列作为重点发展任务的组成部分。2022年8月，北京市金融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金融业发展规划》，其中关于文化金融方面提出“服务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融合发展‘文化+金融’”。北京文化产业主管部门对文化金融发展有较多的期待，北京市“十三五”、“十四五”文化相关规划当中，文化金融都被列为重要工作之一。

所以说，文化金融在首都金融业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至少是“五居其一”。但是，文化金融的发展与这个地位是不很匹配的。综合而言，北京市虽然对文化金融很重视，但文化金融的地位仍未充分体现。同绿色金融、科创金融和数字金融等其他金融业态比较来说，手段上不够丰富，也没有配置更多资源，文化金融作为“五大金融业”之一的重要地位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二、金融如何服务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首都文化金融的战略高度，首先基于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这个前提，只要这个前提不变，文化金融就应有发展的巨大空间，金融也应

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规划实施中尽到应有的职责。服务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是北京发展文化金融有别于其他区域文化金融的重要特征之一。

2020年4月，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发布了《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2019-2035）》。提出“北京成为民族文化精华的展示地、各地优秀文化的荟萃地和先进文化潮流的引领地”的战略定位，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全国文化中心功能更加系统完善，文化建设对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更加强劲，大国之都文化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成为彰显文化自信与多元包容魅力的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在文化产业方面提出，文化消费贡献度显著提升，文化产业创新活力不断迸发，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中心。

这一规划是新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期间北京文化发展的重要指针。在文化金融方面，规划提出要“提高金融对文化的支撑作用”，提出了多方面的重要任务。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政策、体系和基础建设方面的。包括：健全首都文化投融资服务体系，突破产业投融资瓶颈，建设首都文化金融生态圈；研究制定风险补偿、信用风险分担等政策；完善文化产业信用体系和无形资产评估体系；支持优化“投贷奖”政策；培育发展文化产业保险市场，等。这些内容延续了以往工作，具有基础意义。第二部分是项目和工程建设方面的，包括：开展国有文化资本投融资平台试点；推动打造“文创板”；设立北京文创银行；建设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做大做强北京文化企业上市培育基地；推动设立北京市文化发展基金，放大财政资金引导功能，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首都文化产业发展。这些内容都具有开创意义，但其中部分工作难度也较大。

这个规划是北京新发展阶段文化发展规划的总方案，金融服务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可以集中在两个方面思考：

一是金融要从战略上能够服务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总框架。服务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一核一城三带两区”总框架和总布局，即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根基，以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为抓手，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文化产业发展引领区建设。尤其是“一城三带”布局，其中有很多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产业项目，需要金融根据项目特点提供针对性金融服务。二是金融从功能上能够形成具有全国示范和引领作用的文化金融服务体系。包括能否形成具有全国示范作用并支撑北京文化产业规模的文化金融政策体系、机制；能否构建具有全国辐射作用和溢出效应的新型文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能否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产业资本市场体系，等。

虽然规划在金融服务全国文化金融中心建设上有明确的设计，但其中的文化金融发展内容仍需进一步细化并认真落实，还有很多子议题需要仔细研究。如：如何构建首都文化金融生态？投贷奖、房租通与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如何优化？“两区”建设文化金融服务如何推动？国家文化与金融合作示范区如何示范？打造“文创板”的具体内涵和目标是什么？设立北京文创银行如何推进？建设何种模式的国有文化资本投融资平台？新的北京市文化发展基金如何运作？

北京市“十四五”金融业规划也提出要服务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融合发展“文化+金融”，但其中一些措施也待进一步推进，如：如何建立“文化产权+创业投资+期望收益+信用评级”的运营模式？如何加强文化金融“一类一企一策”业务流程再造？如何做大北京文化企业上市培育基地？

三、如何利用首都优势发展文化金融？

北京发展文化金融的重要路径之一是充分利用首都优势，怎么用有待深入探讨。北京作为首都，除了是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还是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同时，北京还是国家金融管理中心，是全国证券交易中心城市之一，北京的城市战略定位对北京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金融来说都是极大的优势条件。

第一，利用科技创新优势，打造新型文化金融发展模式。北京是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正在致力于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企业和科技人才集聚，优势明显，“三城一区”（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和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布局已初见成效。北京推动区域金融改革，正在建设中关村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科技创新优势为北京的文化产业和文化金融发展提供了良好支撑。通过技术创新变革文化金融模式是当下文化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北京加快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产业数字化进程加速，金融业数字化也成为大趋势。比较起其他城市，北京的金融科技公司众多，文化金融数字化有先天优势；北京文化产业资产市场巨大，文化金融服务市场需求旺盛。文化金融数字化这个命题应尽快摆上议事

日程，系统考虑如何利用金融科技发展高质量文化金融，更加高效地服务文化产业发展。

第二，利用国际交往中心优势，实现文化金融发展国际化。北京是国际交往中心，是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我国对外开放中具有示范性和领先性。北京的金融业改革开放也正在深化，世界著名银行、投资银行、国际银行卡清算机构、国际评级机构等都在北京扩大布局。113家国际组织在京落户居全国首位，北京市出台了《北京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专项规划》，明确了战略任务、功能体系和空间布局，这些都为文化金融发展借鉴国际经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在北京市“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中，也提出要在文化旅游服务“两区”建设中支持开展文化金融项目。利用国际交往中心优势发展文化金融，一方面应利用自贸区建设、天竺综合保税区建设这些开放平台和机制创新文化金融服务，强化文化金融服务文化贸易；另一方面还需探索建立文化金融国际交流机制，推动国际文化产业合作。北京市朝阳区发展金融业的主要方向是国际金融，可借助相关平台，开展相关学术交流活动，推动文化金融国际化。

第三，利用国家金融管理中心优势，打造独一无二的首都文化金融生态圈。北京是国家金融管理部门所在地，银行、证券、保险机构总部集聚地，北京各类金融市场主体众多。北京是国家金融基础设施集聚地，具有支付清算、数据、征信、规制等各方面的优势。北京聚集了众多高端金融人才和经济、金融研究机构及智库，其中一些文化

金融智库平台和文化金融研究机构已经具有全国影响力。这些条件能够吸引更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形成更丰富的金融文化场景，这是北京独有的。如何利用这些独一无二的先天条件打造首都文化金融生态圈是值得思考的重要命题。

第四，利用北京证券交易所扩容机遇，推动更多文化企业上市。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是党中央对资本市场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北交所的设立，将打通新三板和主板市场，北京可以完成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体系，意味着北京也成为了全国证券交易中心城市之一，与上海、深圳错位发展，这对我国资本市场格局将产生重要影响。推动更多文化企业上市能够形成更有竞争力的文化企业集群，应利用资本市场改革和北交所扩容历史机遇，推动更多文化企业上市。我认为，有多少文化企业在北京上市，是体现北京文化产业发展和全国文化中心地位的重要指标。

北京是大棋盘，资源丰富，禀赋独特。文化金融不是孤立的，是与其他板块、战略、政策等紧密相关的，应积极研究这其中的关联性，协同发展，协调行动，协作前行。

永续债拓宽中小银行“补血”渠道

资本充足是商业银行经营的底线，也是监管部门开展银行业审慎监管的核心。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加、金融监管趋严以及去杠杆政策加力，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压力增加，亟待建立多层次的资本补充机制，创新多元化资本工具，扩宽资本补充渠道，在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优化资本结构，提升资本充足水平。

一、永续债成为中小银行“补血”的重要工具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其他一级资本补充途径主要是优先股和永续债。但优先股的发行条件苛刻，其发行周期较长、成本较高，对银行业整体资本结构改善相对有限。与优先股相比，永续债发行周期较短，审批许可过程更加简便，且资金成本相对较低，支付的票息还可进行税前抵扣。此外，永续债条款设计灵活，可设计减记条款或转股条款。根据资本管理新规，任何情况下发行银行都有权取消永续债的分红或派息，且不构成违约事件，故不会发生债务违约事件。因此，永续债是当前非上市中小银行补充一级资本的较优途径。

自2020年5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以来，中小银行永续债的发行频次和速度明显加快，农信机构和民营银行也相继成功获批发行永续债。

分机构来看，在发行规模上，大型商业银行永续债发行量最大，占发行总量的 53.79%；股份制商业银行占发行总量的 27.59%；中小银行由于单笔永续债金额较小，发行总量占比较低，仅为 18.54%。但从发行主体数量和发行永续债笔数来看，城商行无疑是永续债发行的主力，截至目前超过半数城商行（64 家/125 家）累计发行 110 只永续债对自身其他一级资本进行补充，发行永续债笔数占全部永续债数量的 60%，累计发行规模达 3628 亿元。但当前永续债对于农信机构、民营银行和村镇银行的资本补充效果并不显著，目前仅有 13 家农信机构和 1 家民营银行成功发行永续债，累计发行规模分别为 404 亿元和 40 亿元。

从 2022 年开始，中小银行永续债发行速度有所放缓。2022 年共有 23 家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总规模 706 亿元，较 2021 年同比减少 55.3%。截至目前，仅有 12 家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略低于 2022 年同期水平。根据《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其他政策规定，商业银行发行永续债应满足近三年连续盈利、贷款损失准备计提充足、拨备覆盖率达标等基本要求，并且当前已发行永续债的商业银行主体信用评级全部在 AA 级及以上，这对于部分城商行和大多数农信机构而言要求相对较高。根据中诚信目前对 280 家农信机构的信用评级结果，仅有 45 家农信机构评级在 AA 级及以上，占比为 16%。

二、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仍有制约

与大型银行相比，中小银行永续债发行相对滞后，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投资准入较为严格，需求端存在掣肘。根据不久前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商业银行投资他行股权需按照 250% 计提风险资产，并且票据互换工具（CBS）无法降低资本占用，因此商业银行自有资金持有永续债面临较大资本占用问题，当前大多通过银行表外银行理财投资间接互持。但对于农信机构、民营银行等中小银行而言，通过自营资金投资永续债的资源禀赋有限、暂无理财资质，也无法通过理财间接互持投资发行。随着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加快，还可能存在投资永续债久期不匹配问题，因此来自银行的资金可能对永续债的配置需求边际弱化。

此外，当前保险、基金等主动投资者占比仍然较小，市场化的投资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此前，保险资金投资银行永续债限制较为严格，要求可投资永续债合格银行总资产不低于 1 万亿元、净资产不低于 500 亿元，且要求主体评级必须为 AAA 级，债券评级必须为 AA+ 级及以上，大部分中小银行很难达到上述要求。2020 年 5 月后，原银保监会放开了上述限制，保险资金参与永续债积极性有所提高。对于各类基金，由于其对流动性要求较高，而银行永续债由于期限较长，有时并不能满足相关流动性的需求，因此当前对于银行永续债的投资相对有限。

中小银行自身实力有限，永续债发行难度较大。永续债本身存在不含有利率调升机制、本金可减记、取消派息不构成违约等特点，叠加其自身信用评级较低、投资者认购热情不高或要求的利率补偿较高等因素，部分中小银行获监管机构批文到正式发行时间间隔长达数月，发行难度较高。

中小银行永续债流动性仍存不足，支持性工具仍有待扩展。由于银行永续债存在需求端准入严格、资本占用较大、估值难度较高、取消派息不构成违约等问题，导致银行永续债的流动性相对不足。为此，人民银行于 2019 年创设央行票据互换（CBS）工具，为商业银行永续债提供流动性支持。但央行票据接受永续债的合格银行标准较高，特别是资产规模不低于 2000 亿元的要求门槛较高，大部分中小银行发行的永续债无法纳入互换标准。

三、“开闸”让更多中小银行参与永续债市场

中小银行在支持“三农”、小微和民营经济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永续债是重要的外源性资本补充工具，未来有必要给予中小银行特别是农信机构和民营银行一定的政策倾斜，以更好支持中小银行健康可持续发展。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适度放松永续债发行门槛，加速中小银行永续债扩容。可设定差异化的发行标准和审批要求，适当放松盈利性和风险指标的标准，降低在资产规模方面的要求，以减少其在资本补充方面的困难。对于农信机构和民营银行，可在涉农、小微等普惠金融监管政策考评框架下，

对绩效评价优异、核心监管指标符合要求的银行发行永续债提供专门支持，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扩大中小银行永续债投资者范围，改善投资者参与结构。当前市场投资者主要为银行自营资金与理财资金，需求端仍有待改善。在机构投资者方面，应当降低各类投资者的参与门槛，例如提高保险资金的投资比例，积极引导社保资金等长期投资者参与永续债市场，并拓展非银机构渠道。在个人投资者方面，可开放个人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发行渠道购买永续债，鼓励风险承受能力强的高净值个人投资者参与该市场。此外，还可拓展银行永续债的国际投资渠道，适当增加境外发行。

扩大央行票据互换操作的规模和范围，提高中小银行永续债的流动性。目前央行开展票据互换合作可接受的银行永续债条件仍然较高，可通过扩大央行票据互换操作的规模和范围，进一步提高中小银行永续债的流动性。一方面，可适当降低接受互换的永续债资产规模要求，更多参考资本充足率或信用评级等风险因素；另一方面，目前可接受的 CBS 交易对手仅为一级交易商，可适当扩大交易范围。同时，进一步丰富银行永续债的支持工具种类，中国人民银行可授权评级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通过增加担保等增信方式，为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提供支持。此外，可将银行永续债纳入银行间市场回购交易合格抵押品，提高市场投资银行永续债的积极性。

声 明

主 办：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

编委会：杨涛、金巍、赵梁皓、齐孟华、崔红蕊、王小彩、罗丽媛

《立言金融评论》为内部交流刊物，其中的报告均由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立言研究院”）的研究团队或特约研究员独立完成，研究报告中的观点、内容、结论仅供参考，立言研究院不承担任何单位或个人因使用本信息材料而产生的相关责任。本刊物的文字内容归立言研究院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使用。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商务楼 7 层

邮 编：100020

网 址：www.lifd.org.cn

联 系 人：赵梁皓

联系方式：010-65978026 18600125007

邮 箱：lianghao.zhao@lifd.org.cn

传 真：010-65973508



立言研究院公众号